

册 出版物作·史料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争鸣录**

范泉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册 出版书物作·史料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争鸣录**

范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范泉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7
(出版博物馆史料丛书)
ISBN 978 - 7 - 5458 - 0406 - 5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中国文学: 近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9310 号

责任编辑 李佳悻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

范 泉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5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406 - 5/I · 142
定 价 48.00 元

序

丁景唐

2010年阳春四月，我在医院里平静地度过了九十岁生日。回首往事，一辈子从事文化出版事业，许多往事值得回味。赵家璧1935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出版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作了总结，意义重大。近五十年后，80年代我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期间，编辑出版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随后，我的同仁们编辑出版第三辑和第四辑的《大系》。二十年后的2000年，由王蒙、王元化为总编辑组成编委会完成三十卷第五辑的《大系》。这样，一代人接一代人，费时七十五年圆满地完成了自五四运动至200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五辑一百卷的宏伟的历史长卷。在此期间，以范泉为总编纂与上海书店共同策划编纂一套三十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这是有关新文学的内在源流，前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①。自此，我国从1840年到2000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百六十年间的文学，都有了系统的总结，这是出版史上的重大工程。

金秋十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的林丽成，偕同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俞子林来看望我。大家欢快地畅谈上海出版工作的一些往事。谈到当年范泉为总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时，编有一

份《〈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以下简称《信息》），自1987年12月20日至1992年4月12日，共七十四期，约四十万字。这既是一份完整的出版档案，记录了该书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包含着很多工作经验，同时又是一份由全国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对我国近代文学许多问题展开讨论的争鸣集和探索录。他们提议要把这份信息排印出版，以保存史料，供学术界出版界参考。我十分欣赏，完全赞同。他们又提出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想我虽不是近代文学大系编者，但确实关心过他们的工作。记得范泉在着手编辑之前，曾专程访问我，要我谈谈编辑新文学大系的经验，供他参考。1987~1988年，我因病偕老伴到滁县五儿丁言模处养病。期间，接到了三女丁言昭自上海转来两期《信息》，我即致函范泉说，“欣悉这一‘前无古人’的近代文学大工程已开过编辑工作会议，可庆可贺”。我经过思考，在信中写了《七点建议》（刊登在1988年1月16日《信息》第四号），后来又多次口头或书面向他们提供意见。有一次还曾特地去他们编辑室，当面交换意见。

那时候上海书店还不是正式出版单位（只限于影印古旧书刊和民国丛书类）^②，编辑室设在一条弄堂里的楼上。木制的楼梯，暗淡的灯光，我上去时差点摔跤。编辑室在木结构人字形屋顶下，摆放着三张写字台和几个书橱，显得简陋。工作人员除范泉是总负责人外，还聘请了王知伊、周劭、杨友仁三位退休老编辑，以及两位青年编辑郑晓方和龚建星。我当时曾想：以他们这样的条件，既没有“红头文件”开路，又缺少强大的编辑力量，要办成这样一件大事，把我国近代八十年间的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范泉语），是十分艰难繁重的。

后来的事实说明，范泉和上海书店的同仁们，群策群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达到了既定目标，在不到十年时间内，编辑出版了一套十二集三十卷二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

系》，并获得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上海书店主持人和范泉都有很强的事业精神和坚韧的决心。上海书店曾多次勇挑重担，完成一些重大出版工程，如影印全套《申报》、《良友画报》等。范泉在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被流放青海二十多年，于1986年回到上海后，立志要为文化出版事业做几件事，把失去的年华追回来。为此他不顾年逾七旬，起早摸夜，决心要把这件大事做好。其次是在范泉奔波策划下，上海书店聘请各地专家学者，组成一个强大实干的编委会和各分集编辑班子，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了任务。由于编委和编辑成员分散在上海、北京、广州、开封、苏州等多个城市，他们创造性地编辑了一份《信息》，起到了交流情况，统一认识，推进工作的作用。我在当时就在一份书面意见中赞扬说：

《信息》编得好，一拿到手，我立即就看，急想知道新近各位专家所发表的一些好的见解，从中受到启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因为每次都有新鲜的东西。好像人虽然分布四方，却相会在“文化街”头，大家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我似乎也身临其境了。这种体现了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良好学风，令人获益匪浅。我个人以为，这在学术工作和编辑工作中是很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成功的基础。

关于《信息》，前辈作家施蛰存先生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编辑过程中，印发一种《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使散居各地的编委、各分集主编、编辑工作人员乃至有关专家学者，有一个互通信息、互相讨论的场地，有利于提高编选质量，加快编辑

进程。这一方法，以前各出版社编辑大型丛书、辞书、类书，似乎都没有用过。我建议把这七十四期简报合为一书，选编出版，给今后各出版社编辑大书时作一个榜样，也可以给近代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批有关近代文学几个专题的争鸣资料。

现在出版博物馆（筹）愿意把全份《信息》列入“出版博物馆文库”史料系列出版，正是实践了施先生的提议，是一件有益于文化出版事业的大好事。它的出版，不仅可以为编辑出版大型图书提供一份成功的范例，也可以为近代文学以至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可供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素材。曾经争鸣、探索过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而且，我还认为，探索和争鸣，既有融和与认同，也有突破与创新，对中国近代文学史诸多方面，对作家作品的新理解，新的研究方法，供后人阅读、研究，必然有很大帮助。

我对它的出版表示祝贺。

更想到2010年是范泉同志逝世十周年，再则，此书的出版，也是表达我们对范泉同志深切的怀念之忱。

我愿，亲爱的读者珍惜这份宝贵的精神粮食。

2010年10月30日 于华东医院

① 上海光华大学（暨附中）校友会曾编印一期专刊，介绍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辑，范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恰巧，三人都是光华大学（暨附中）校友会校友。可说是一种缘，一段出版史上的佳话。赵家璧，1925年入光华大学附中就读，1928年转入光华大学文学院，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范泉，1931年考入光华大学附中，1935年考入光华大学历史系，两年后改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1年毕业。丁景唐，1939~1943年肄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

② 上海书店开始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时间为1987年12月，1988年6月由新闻出版署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

出版说明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是范泉总编纂、上海书店出版的一套大型文学资料系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曾编印一份《编辑工作信息》（以下简称《信息》）。

《信息》共七十四期，记录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也记录了曾经讨论、争辩过的近代文学时代精神、编辑思想等问题。由于讨论比较深入、开放，参与者多为名家学者，引起学界关注，曾被一些报刊介绍、转载。

现在我们决定把全份《信息》排印出版，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保存一份编辑出版史料。它所实行过的一些做法，或可作为今后编辑此类图书的借鉴，同时也可给阅读、使用本书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以及本书的编纂特色。二是为了给近代（也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一份资料。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曾经讨论的问题，涉及范围较广，有的讨论较为深入，有的尚未充分，正可以为进一步探讨研究提供一些素材。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倡议人和总编纂范泉，是一位编辑大家。他在编辑本书以前，曾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由他主编的报刊、丛书达二十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上世纪40年代上海出版的《文艺春秋》（初为丛刊，后为月刊），产生过重要影响。50年代后

期那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1986年他重返编辑岗位后，便提出了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设想。他的设想得到了上海书店的采纳，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批准。

当他着手编纂这部《大系》的时候，既有他以前的丰富编辑经验可资利用，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是近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过去了百年，资料繁多而散乱；其次是从事编纂者都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只能借助于自行开掘；第三是对近代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比较薄弱，缺少现成研究资料参考。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范泉于工作初期的两三个月内，访问了京沪等地的六七十位专家学者，虚心听取意见，广征编辑人才，初步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一、充实调整编辑方案，初步确定《大系》框架为十分集、一千五百万字（后增至十二分集、二千万字）；二、聘请《大系》总编纂委员会成员及分集主编（初为十七人，后增至二十五人）；三、建立上海书店《大系》编辑室。1987年12月10日，上海书店召开第一次《大系》编辑会议，《大系》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现在我们通过《信息》的了解与回顾，可以发现《大系》的编辑工作至少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充分依靠和发挥《大系》编委的力量

《大系》总编纂委员会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各分集的主编。他们大都是各该学科的专家教授。他们长期工作在教学、研究岗位上，掌握有较充分的学术信息，也熟悉资料来源。由他们组成分集编辑班子，承担最繁重的编辑任务，是完成《大系》编辑任务的可靠保证。另一部分是不担任编辑任务的编委。他们大多是前辈学者，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大系》的编辑出版出谋划策，竭尽心力。如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他最早提出《大系》各集“卷数的分配实与选材观点相联系”，“编辑室应注意观点之统一”，为推动编辑思想大讨论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争鸣过程中出现分歧时，他指出：“编辑《大系》是一项集体的协作工程，不少技术性问题需要群策群力，通过大家讨论的方式，逐渐缩小各种可能存在的差距。对（各集）主编同志既要尊重，但也不能盲目迁就。既然《大系》的编选具有历史意义，那么，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也就是说，反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相信编选的同志也会谅解的。”他本人对此也是身体力行，一方面积极提出意见，一方面从善如流修正自己的看法，表现出学者风度。本书编委会还有一个特色，即是学者型的，受聘者都为专家教授。编委王元化先生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也是以学者身份受聘。他非常重视和关心《大系》的编辑，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还特地写了一封四千余字的长信（实际是一篇专论），来论述翻译文学对我国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影响，以及编辑中国文学大系和中国文学史必须纳入翻译文学的意义。

第二、编印《信息》沟通情况开展学术争鸣

编印《信息》是为了“沟通情况，协调部署，相互借鉴，以保证编选质量的提高”，同时还开展各种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其中有些是编选思想、编选原则、编务方面的问题，有些涉及近代文学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它的发展脉络、流派和作家、作品的评价等，具有学术意义。正是这些讨论进一步明确了编选《大系》的指导思想，为提高《大系》编选质量创造了条件。

编印《信息》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赞扬，认为它“体现了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好学风，起到了集思广益，增进了解的作用”。有的说：“《信息》编得好，我爱看。几日不看，即觉有所未见，茫然有惑于中。其所以好，在于大家讨论，放言无忌。”有的说：“《信息》不只是对《大系》的编纂报道，而且是一篇篇严肃认真的学术文章的合集”；读《信息》“仿佛面对师长，晤听他们侃侃谈吐，真有珠玑贯耳之乐”。上海《文汇报》、《文学报》、《解放日报》、《新民晚

报》、《语文报》、《上海新闻出版》、《联合时报》、《文化艺术报》，安徽《文化周报》、无锡《无锡日报》、天津《今晚报》等许多报刊曾予以报道，或转载部分文章，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很大反响。

参加《信息》各种问题讨论的，除《大系》编委和编辑人员外，还有很多与《大系》无直接关联的人员，其中有大学师生、知名作家、研究者、出版社编辑等，从年龄层次看老中青都有，约略统计达一百人左右。他们中有的受到《信息》讨论内容的吸引，有的是《信息》编者约请的。范泉先生曾为此花了大量心血，仅先后写信就达一万二千多封。

第三、于细微处见精神

编纂《大系》，既要重视如编辑思想等重大问题的把握，又十分注意细节的处理。如各集收辑范围的分工，看似简单却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笔记文学集》与《小说集》之间，有一个“笔记小说”问题。有人认为它属于小说而非笔记，施蛰存为此写了一篇考证来论述“小说的历代概念”，他以古今中外小说一词的演变，来说明“笔记小说”不是小说。关于“俗文学”，有专家提议可否以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来替代，该集主编金名认为“俗文学”不全是“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可说是“俗文学”。《大系》最终是以分别设立《俗文学集》和《民间文学集》处理的，前者收曲艺即说唱文学，后者收群众集体口头创作的文学，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谜语等。在《散文集》内，也有一个只收文学散文或也收政论和学术文的问题，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其他还有许多细节，如丛书名与各分集名称的英译问题，《三侠五义》的版本选择与作者署名问题，《杨乃武与小白菜》（曲艺）的历史真实与文艺创作问题，以及作者小传、曲种介绍等等，都经过讨论和研究，作了慎重的处理。

中国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只有短短的八十年（1840～

1919)，但它是古代文学演变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转型期。没有近代文学的量变，就没有现代文学的质变。研究现代文学而不研究近代文学，许多问题说不明白。但是学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十分薄弱，原因之一便是近代文学资料繁散乱，尚未经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上海书店和范泉先生编纂这部《大系》，正是补了这个空白。

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是一项创造性劳作，但它不是创造文学，而是把原已存在的文学资料进行整理。如《大系编辑设想》所说：“要把这些浩似烟海、隐显错杂、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编纂《大系》的一个基本要求，便是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反映本来面貌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来文照录，而是有所选择的，这就有一个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选文的问题。在大约二三年时间内，《大系》编委会为此组织了一次次讨论、争鸣和探索，并在《信息》内得到反映。略举数例：

一、怎样表现近代文学的时代精神。徐中玉教授说：“近代文学理论产生于一个大动荡、大变化、大转折的时代……我们这部《大系》要注意反映出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多选这方面的材料，少选一般的材料。”季镇淮教授说：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则不见其革新的色彩与时代精神”。

二、怎样处理好近代文学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陈则光教授说：“要使《大系》编得有质量、有水平，我认为首先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要精、要准、要客观，也要照顾全面，使各个流派各种倾向都要有所反映。以时代主流为主，支流副之，逆流也可选少量有代表性的作品，附录于后，勿使偏颇，而有遗珠之憾。”

三、怎样区别新旧而有所取舍？陈子展教授说：“在此选录年限之内，各种各家之著作不少，搜求并不容易。贵耳贱目、重古轻今者有之；一人之见闻有限、嗜好偏异者有之。编选作品当特重其能反映此一段时间之生活（属于历史的），此一段空间之背景，而其思想有走向前进之意愿，与其文学似有新变之风格者。……凡不三不四之人不痛不痒之论，遗老遗少之作品在所必斥。”蒋锡金教授说：“中国的近代文学实处于伟大的变革期中，《大系》应着意反映这种变革，而不应固守传统之旧。”

四、要兼顾全面。柯灵先生说：“眼界宜宽不宜窄，要在微观中体现宏观，兼顾光明面和黑暗面，进步因素和落后因素。因为现实本身就是这样的复杂。”“要兼收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所发的也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包括正反两个方面）。但也不要遗漏不为人知而内容可取者，以免贻遗珠之憾，这是不能以当时是否发生影响或影响大小为准的。”贾植芳教授说：要“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和文风，包括各种文学流派的文学观点，作品的体裁和主题，以至艺术表现形式和特色诸方面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五、怎样体现近代文学的过渡性。孙文光教授说：“特别是，这一时期文学中所出现的新的萌芽，应当充分地、客观地给予反映。这样，才能如实地说明，中国近代文学所特有的复杂的、过渡的、承前启后的诸种时代特征，而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旧的传统文学的收束或结穴。”时萌教授则以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晚清的新派诗和吴趼人等吸收西洋小说技巧创作的小说为例，来说明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桥梁。

这里还涉及一些从近代到现代的“跨代”作家的作品是否应予收录的问题。孙文光教授认为：“它们的出现（指五四以前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不能完全等同某一作家的特殊经历，而是近代文

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应当在我们的《大系》中占有它们应有的位置”。

六、关于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施蛰存教授说：“许多同志希望《小说集》的编选标准要顾到思想内容的时代、时事反映意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戊戌变法、鸦片之害、军队的腐败、封建婚姻、官僚主义等等，都有人推荐作品。这个观点，我当然赞同。不过，如果五卷《小说集》的作品尽是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现实，而作品本身都平庸乏味，这种选法，岂非‘买椟还珠’？……我虽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派，但还是主张要看看这个作品够不够代表‘近代文学’。”

七、怎样评价“礼拜六派”的问题。楼适夷先生说：“从吴趼人、李伯元开始，后来大大发展称为‘礼拜六派’的文学，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所谓‘市民文学’，新文学运动后对他们不予重视，今天应该重新估价。”又说：“‘礼拜六派’一向被人与‘鸳鸯蝴蝶派’混淆，全盘抹杀，是错误的。其实它在当时有巨大影响，也是时代产物，极大部分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思想、社会潮流、民俗风物，是一种‘市民文学’（在日本称为‘町人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亦起过一定承启作用。”锡金先生同意楼适夷的看法和意见，认为“一切应就作品论事”。并认为“鸳鸯派”是反对他们的人所加的恶称，“事实上不足以概括他们的作品的内容”；“礼拜六派”是他们的自称，“其含义实类于现今的‘周末版’或‘星期版’，所以是不足以厚非的”。

八、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施蛰存先生提出：我国历史的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但从文学发展的情况看，近代文学的下限应该是1917年胡适回国，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号召新文学运动的一年；如果这样，就不能因白话诗出现在1917年而把它划入近代文学了。施老还以《小说集》为例，1900年以

后才出现近代型的新小说，则近代小说的上限似应为 1900 年。讨论者则认为：时代进入近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可能一下子都进入近代。

《大系》要选具有近代精神的小说，也要选前后于近代精神的小说，这样才能全面反映近代人的生活面貌。

上面罗列的一些问题，虽然还不是讨论问题的全部，所举也只是其中的一说而已，已可见讨论情况的一斑了。由于讨论始终是围绕《大系》编纂的需要而进行的，有些讨论得深一些，有些讨论得浅一些，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探讨，这正是出版本书的另一个目的。

这次我们把全份《信息》排印出版，增编了一些史料性资料性图版，在文字方面，除改正一些错字及作些技术性的注释（以 * 符号标示排于页末）以外，均无改动，原式照印。

感谢出版博物馆（筹）对本书的出版给予资助。

俞子林

2011 年 1 月 20 日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

编辑设想*

一 缘 起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清王朝腐朽崩溃、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反映在文学上，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反映现实社会、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语合一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五四

* 这份编辑设想是当时的讨论稿，范泉执笔。后在编辑过程中在框架等方面作了调整。为保持历史原貌，收入本书时未作改变。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隐显错杂、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二 框 架

《大系》共分十集：(1) 文学理论集，(2) 小说集，(3) 散文集，(4) 诗词集，(5) 戏剧集，(6) 俗文学集，(7) 笔记文学集，(8) 书信日记集，(9) 翻译文学集，(10) 史料索引集。

《大系》应是选集的规格，宏观控制的全部字数为一千五百万字左右，分三十卷出版，每卷约五十万字。优秀的长篇将单独出版别集，作为《大系》的附编，约五百万字。正集和别集合计为二千万字左右。（订购《大系》者，可以同时订购别集，也可以只订《大系》本身。）

每集之首，冠以分析性序文一篇，集尾附录尚未编选而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编目。

每一作家，附加一百字左右的小传简介。

开本版式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同，即大三十二开，横排，主文用老五号字，分段，加新式标点。注释排在本页末，用六号字。重要图片彩印。

各集序文前，拟约请李一氓同志撰写总序一篇。